



中国近代战争史（七）

李大伟 编著



目 录

护法战争	1
护国战争后的国内形势和护法运动的发生	1
南北政府的战略方针及兵力部署	6
北军第一次攻湘之战	9
北军第二次攻湘之战	29
滇黔靖国军攻川之战	45
粤、闽、赣地区的作战	59
护法军政府改组与孙中山离粤	71
护法战争的历史意义和失败的主要原因	74
反对沙俄侵略蒙古的战争	78
沙俄策动外蒙“独立”	78
沙俄策动呼伦贝尔“独立”和乌泰叛乱	86
政府军抗击外蒙叛军向内蒙的进犯	90
《恰克图协约》的签订	105
反对沙俄侵蒙战争的经验教训	108
反对英国分割西藏的战争	111
英国唆使西藏亲英分子发动叛乱	112
川滇两省出兵平乱	115
川军攻占乡城，稳定川边局势	120
英国分割西藏阴谋的破产	124
战争的经验教训	128

护法战争

护法战争，是继护国战争之后，由孙中山发动的旨在维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反对北洋军阀独裁专制统治的革命战争。在这次战争中，桂、滇、粤、湘、鄂、川等省的军阀，打着护法的旗帜，在湘、川、鄂、粤、闽等省与北洋军阀集团的军队及依附于该集团的地方势力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军事角逐。本章着重叙述双方在主要战场湖南的作战经过，并简要叙述川、粤、鄂、闽战场的作战情况。

护国战争后的国内形势和护法运动的发生

护国战争结束后，中国在表面上出现了南北统一的局面，但实际上社会矛盾非但没有缓和，反而更加尖锐激烈，突出地表现为军阀集团之间的纷争加剧，以及民主革命势力与军阀势力之间在维护与毁弃《临时约法》方面存在着尖锐的斗争。

袁世凯死后，帝国主义列强失去了控制中国的总代表，便各自寻找自己的代理人，达到其继续侵略中国的目的。于是，在帝国主义列强支持下的各派军阀，乘机扩大权势，割据称雄。在北洋军阀内部，逐渐分裂成两大派系，即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和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皖系军阀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控制着北京政府和安徽、陕西、山东、浙江、福建等省，在各派军阀中势力最大；直系军阀逐渐投靠美、英帝国主义，占有江苏、

江西、湖北等富庶省分，实力仅次于皖系。除以上两大军阀集团外，还有在东北崛起的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集团，和在护国战争中发展起来的以唐继尧、陆荣廷为首的滇、桂军阀集团，它们都具有相当的实力。此外，尚有盘踞于某一省或某一地区的军阀势力，如山西的阎锡山、徐州的张勋和琼州（今海南岛）的龙济光等。这些大小军阀为了各自的私利，招兵买马，争权夺利，纷争不已。

中央政权是军阀争夺的焦点。自 1917 年 3 月开始，总统黎元洪和国务总理段祺瑞围绕着要不要对德宣战问题而展开的“府院之争”，标志着这种权力斗争进入了白热化。1917 年 2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已进入后期。日本政府为了控制中国，积极怂恿段祺瑞政府对德宣战。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为了捞到帝国主义的“参战借款”，以便购置军械，扩充实力，便进一步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决意”对德宣战。4 月 25 日，段祺瑞召集“督军团”成员到京举行会议，拟定了对德“宣战案”，胁迫黎元洪和国会同意参战。当参战提案遭到国会抵制后，段便以督军团的名义要求大总统解散国会。黎元洪则在国会的支持下，于 5 月 23 日下令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的职务。于是，段祺瑞愤然离京，当即唆使八省督军宣布“独立”，并于 6 月 2 日在天津设立独立各省总参谋处，以武力威胁总统。黎元洪为了摆脱僵局，邀请徐州的张勋入京“调停”。

6 月 14 日，张勋以调停“府院之争”为名，率三千辫子兵开进北京。接着，便演出了一场蓄谋已久的复辟丑剧。7 月 1 日，张勋带领清朝的旧臣遗老数十人进入清宫，将十二岁的已废皇帝溥仪重新拥上黄龙宝座，宣

告清帝复辟。黎元洪发现受骗，逃离总统府，躲进日本使馆，电请副总统冯国璋代行总统职权，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并委托冯、段合力筹划“救国大计”。复辟消息一经传出，“全国民情，莫不反对”。北京十几家报纸一律停刊，以示抗议。上海、天津、武汉等地的人民也纷纷口诛笔伐，愤怒声讨。本来暗中支持复辟的段祺瑞，见驱逐黎元洪、解散国会的图谋已经得逞，于是摇身一变，马上打起反复辟的旗号，于7月3日在天津马厂誓师，宣布出师讨逆。12日，段亲率“讨逆军”进攻北京。辫子兵一触即溃，张勋逃往荷兰使馆，其余复辟分子也作鸟兽散，溥仪再次宣布退位。于是这一复辟丑剧仅演出十二天，就迅速破灭了。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一直站在反对复辟帝制，反对北洋军阀，为维护《临时约法》和国会而斗争的最前列。早在袁世凯死后第三天，孙中山即发表《规复〈临时约法〉宣言》，表示：“袁氏既去，当与国民共荷监督之责，不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1917年3月起，孙中山又接连发表声明或通电，反对对德宣战，维护国会职权。当段祺瑞和督军团怂恿张勋进京“调停”时，孙又揭露张勋将胁迫黎元洪解散国会、推翻约法的阴谋，并吁请西南各省督军“克日誓师，救此危局，作民保障”。西南军阀懂得，对他们威胁最大的乃是北洋军阀，因而在“府院之争”中，表示拥护黎元洪，支持国会，维护《临时约法》，反对北洋军阀专权擅政，客观上表现出一定的进步性。当同年4月段祺瑞逼迫国会通过“宣战案”，北洋八省督军企图以武力倒黎时，云南督军唐继尧即发出通电，反对武力干政，拥护总统和国会。6月11日，广东督军陈炯明、广西督军谭浩明和

驻粤滇军总司令李烈钧联名通电，宣布联合西南各省，兴师讨逆。6月20日，陈、谭两督军以国会被解散为由，宣布桂、粤两省“自主”，不承认非法内阁。张勋复辟后，孙中山立即在上海召开会议，主张武力讨贼，并制定兴师北伐的军事计划。西南各省也同仇敌忾，纷纷组织军队，准备出师北向，戡定复辟逆流。7月6日，孙中山偕同廖仲恺、章太炎、朱执信等人自上海乘“海琛”号军舰启程赴粤，准备以广东为基地，组织护法讨逆。但孙中山等尚未抵粤，张勋复辟丑剧即告结束。

经过张勋复辟这场风波之后，黎元洪被迫下台，冯国璋为代理大总统，段祺瑞重任国务总理，中央政府实权仍操在皖系手中。段祺瑞一上台，就公开宣布“一不要约法，二不要国会，三不要旧总统”，顽固地坚持专制独裁统治。同时，为了对付革命势力，段祺瑞进一步投靠日本。他对日本首相寺内表示：“中国政府几经变化后，我再度出任总理。将来一切施政，当按预定方针进行。中日两国如欲加紧协作，确保亚洲的和平和安宁，舍此当无更好的时机。”寺内马上“表示出会心的满意”，决定以更多的借款和武器支持段祺瑞政府。于是，段祺瑞更加有恃无恐，大肆扩充军备，调兵遣将，企图实现其“武力统一”的野心。

在这种情况下，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便将斗争的矛头直指以段祺瑞为代表的北洋军阀，决心坚持在南方领导护法斗争，以“建造真共和国家”。7月17日，孙中山一行抵达广州。当晚，孙在欢迎会上发表演说，阐述了护法宗旨，提出“以海陆军之力量，为国民争回真正共和”，并呼吁各界人士共同为维护约法，再造共和而斗争。19日，孙电邀国会议员赴粤集会，组

织护法政府。22日，海军总司令程璧光与海军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懌率该舰队由吴淞口驶赴广州，参加护法运动。一个月之后，一百五十余名国会议员到达广州，响应护法；驻粤滇军和广东地方派军人也多被吸引到护法的旗帜之下，或采取中立态度。8月18日，孙中山在黄埔公园宴请到粤议员，议定召集“非常国会”，组织护法军政府。军政府设大元帅一人、元帅二人，在《临时约法》未恢复效力以前，中华民国的行政权由大元帅行使。

8月25日至9月1日，非常国会在广州开会，通过了军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孙中山为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陆荣廷和唐继尧为元帅。孙中山认为“拥护约法，实唯西南是赖”，把护法的希望寄托在西南军阀唐继尧、陆荣廷身上。

两广和云贵军阀所以能在某种程度上支持孙中山的护法主张，是由于他们清楚地看到，段祺瑞推行的武力统一政策，除对付革命派以外，也是为了吞并西南各省。因此，他们都想借助孙中山的威望，与段祺瑞相抗衡，并趁机扩大自己的地盘和实力。但是，他们又不想完全搞僵与北洋政府的关系，因而提出只反“非法内阁”，不反大总统，并注意与孙中山的政治主张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便把军政府作为筹码，随时准备与北洋军阀讨价还价，进行“一番交换”。正是出于这种动机，故在军政府成立的第二天，陆荣廷即发出通电，反对以元帅名义另设政府；9月8日，唐继尧也通电表示不受元帅职。军政府成立伊始，内部就出现裂痕，表明孙中山与西南军阀的联盟是非常脆弱的，护法运动的前途将不会是平坦的。

尽管如此，孙中山并未却步。9月10日，他正式宣

誓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发布就职宣言，表示“当竭股肱之力，攘除奸凶，恢复约法，以竟元年未尽之业，雪数岁无功之耻”。并随即以大元帅名义，下令讨伐段祺瑞等民国叛逆。在这种情况下，北洋军阀内部矛盾暂时有所缓和。9月29日，冯国璋下令对军政府成员“一体缉拿交法庭依法迅办”。10月1日，段祺瑞宣布“出师剿灭”南方的军队。

不久，护法战争的战幕正式拉开，并先后遍及湖南、湖北、四川、广东、福建，而以湖南战场打得最为激烈。

南北政府的战略方针及兵力部署

护法运动兴起后，段祺瑞政府决定对西南各省用兵，企图实现袁世凯未能实现的“武力统一”中国的计划。

护国战争结束后，各派军阀为了争夺地盘，拚命扩编军队。到1917年6月止，全国正规陆军已由护国战争时的五十万人增加到六十余万人。其中北洋政府陆军部直辖的部队，已由护国战争前的十二个师、二十个混成旅增加至二十一个师、二十三个混成旅；加上张勋的定武军七十营、倪嗣冲的安武军四十余营、姜桂题的毅军二十营，总兵力达三十四万余人。其中能调往前线作战的部队，约在十万以上。这是段祺瑞赖以发动内战的基本力量。

以孙中山为首的护法军政府所统辖的军队及响应护法的军队，主要有由陆荣廷控制的驻广东的两师两混成旅、驻广西的两师一旅，由唐继尧指挥的分驻滇粤川的六个师，还有贵州的一师一旅和湖南的两个师，以及由海军总司令程璧光率领的第一舰队（包括巡洋舰三艘，

炮舰六艘，其它辅助舰只四艘）和陈炯明统带的二十营海军陆战队，总兵力约十五万人。与北洋军相比，南军总兵力虽居于劣势，但由于在本地区作战，可将大部兵力投入战斗，因而在战场兵力对比上与北军不相上下。

段祺瑞“武力统一”的主要战略目标是广东，因广东不仅是护法军政府所在地，也是滇、桂、粤军的联合基地和西南各省与海外交通的枢纽。关于北洋政府的战略意图，段祺瑞的心腹智囊徐树铮后来透露说：“盖欲定大局，非谋统一不可，欲谋统一，非川粤同受政府节制不可。以川较粤，川可稍缓，而粤宜急，粤定川或随之而自定。我之争湘者，为图粤计耳；粤不定，湘即危，湘有事，鄂亦不安，大局则时有摇动之虞”。简言之，段祺瑞要想武力统一全中国，必须征服粤、川，并以征粤为先，而征粤又必先攻湘。因此，湖南就成了北洋军阀进攻的首要目标。

湖南北通江汉，南接两广，西邻川、黔，是北军攻取西南诸省的必经之地。早在广州军政府成立之先，段祺瑞便利用北洋政府的“合法”地位，于8月6日下令免去湖南省长兼署督军谭延闿的督军职务，以皖系人物前陆军部次长傅良佐代之，并调北洋军第八、第二十师随傅入湘，企图不战而控制湘省。与此同时，段还派部分军队入川，企图控制川省；并令闽、浙、赣抽调军队攻粤，以策应湖南战场作战，使南军首尾不能相顾。

谭延闿是个介于进步党与国民党右翼之间的“八面玲珑”的政客，由于利害关系，和桂系头子陆荣廷关系甚密。谭被免职后，忙向陆荣廷求救。陆荣廷等桂系军阀清楚地看到，“湘省为两粤门户，又系滇黔咽喉，湘失则西南腹背受敌，不特进取之机全无，且（北军）得

湘实足以制西南之死命而有余”，故一面令桂军向湘边运动，做出援湘姿态，一面致电冯国璋，请冯设法收回撤换湘督的命令，维持湖南现状，并提出划湖南为南北军事缓冲地带，以保持南北和平。冯国璋把电报转给段祺瑞，段严辞拒绝，说：“今日文人不能将兵，已成各国通例，为军事计，为湘省计，为组菴计，皆以专办民事为宜”；并声称“明令早颁，势难反汗”。

谭延闿并不就此甘休，他电请西南各省迅速派兵援湘，以与段祺瑞兵戎相见。唐继尧、陆荣廷对谭的主张表示赞同。8月16日，陆致电西南各省说：“湘督易人，北方疑忌西南之心业已揭露。唇亡齿寒，急应力筹对待。”次日，滇督唐继尧复电陆荣廷，表示：“湘危则全局破坏，亟宜协力援助”。唐、陆虽表示援湘，但又各保实力，不愿在作战中打头阵。桂军陆裕光第一师进抵湘桂交界之黄沙河后，便顿兵不前，观望形势。

滇、桂不及时发兵增援，湘军主要将领对抵抗北军也表示冷淡，谭延闿出于无奈，于9月9日向傅良佐移交督军印信，微服潜往上海。至此，北军势力得以首先伸入湖南。

广州护法军政府成立后，孙中山即接连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出师北伐的战略方针问题。10月9日，提出了基本战略设想，即：1.派员与陆荣廷及两广督军等磋商抵御龙济光的计划；2.以滇军第三师援湘；3.以滇军第四师及海军即日誓师攻闽；4.饬陈炯明、朱执信两军长加紧招募训练部队，为滇军、海军后援；5.电陆荣廷、唐继尧火速出大军，会师武汉。

不久，护法军政府确定了基本作战方针：“以长江沿岸为主作战地，先克武昌，次定南京，击攘敌军长江

一带之势力，再图直捣北京。”据此，拟动员南军约十个师，组成中央、左翼和右翼军，分三路北伐。同时，拟定了分期作战的计划。第一期作战计划是：中央军由两广进击长沙，肃清入湘北军，待左翼军（滇黔军）进据四川并东入湖北时，与之合攻武昌；左翼军首先攻占四川，尔后派一支队扼守川北，牵制晋陕之敌军，主力乘势东下，与中央军合攻武昌；右翼军与海军协同，合攻闽、浙，再取淞、沪，待中央军、左翼军攻克武昌后，与之会攻南京，并肃清长江上、下游之敌军；海军在随右翼军占领淞沪后，即以吴淞为根据地，封锁长江门户，并消灭江内之敌舰，配合陆军进攻南京。第一期作战计划预计在 1917 年 11 月下旬全部完成。尔后，各路南军在长江以北过冬，补充给养，休养兵力。第二年春季开始实行第二期作战计划：中央军由津浦路北进；左翼军由京汉路北进，其川北支队出秦晋，袭击北军侧背，策应正面行动；右翼军则由海路北进。三路军分道并进，会攻北京。上述作战计划，虽然反映了孙中山的革命气魄和军事胆略，但以有限的兵力，分散于广阔的战线上，企图一举破敌，囊括全国，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后来由于军政府“有府无兵”，西南各省军阀“有兵无府”，根本不听孙中山的调度指挥，这一作战计划也就未能实行。

北军第一次攻湘之战

一、湘南宣告自主

谭延闿督湘时，湖南共有军队六万余人。其中归督军直辖的有第一、第二两个师及六个区的守备队（每区

的守备队三至十余营不等），加上各道尹、总兵所辖的守备部队共四万余人；另有全省警备队二万余人。两个正规师中，第一师师长赵恒惕，下辖第一、第二旅。第一旅旅长李佑文，所属第一团驻湘阴、平江，第二团驻长沙；第二旅旅长林修梅，所属第三团驻宝庆（今邵阳市），第四团驻衡阳。第二师师长陈复初，下辖第三、第四旅。第三旅旅长陈嘉佑，所部驻常德；第四旅旅长朱泽黄，所部分驻长沙、湘潭。

谭延闿离职前，任命刘建藩代理零陵镇守使，并调第一师第二旅旅长林修梅由衡阳移驻衡山，以便随时配合桂军作战。刘建藩和林修梅都是革命党人，先后参加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和护国战争，在湘军中威望较高。傅良佐于1917年9月9日到任后，知道刘建藩、林修梅是谭延闿安排的两个心腹，将威胁其在湘南的统治，于是下令免掉了他们的职务。在此情况下，刘建藩、林修梅被迫于9月18日联衔宣布湘南自主，通电揭露段祺瑞“违法横行，破坏国纪。……易湘督以为武力征服之图”；声明“特率湘南军民子弟，宣告自主，与段政府脱离关系，一切军民政务，均与海军、两广、云南各省一致进行”。接着，湖南第一区守备司令吴剑学、第二区守备司令周伟和铁道守备司令李仲麟，相继宣告自主。孙中山致电刘、林等人表示祝贺，并派革命党人林祖涵（即林伯渠，林修梅之弟）为湖南劳军使，前往湘南慰劳举义部队。

湘南宣告自主，傅良佐异常惶恐。此时北洋军仅有第八师先头部队两个营抵达湘阴，傅只得先令湘军第一师代师长李佑文，率该师第一旅开赴衡山“相机剿办”。

9月20日，李佑文率第一旅离长沙南下，命第一团

团长梅倬敏率部从株洲沿湘江东岸开进，李随彭树煌之第二团由湘潭沿湘江西岸南进。22日，第一团在衡山县七里滩与林修梅部接战。该团第三营不愿“以湘人攻湘人”，于28日在衡山石湾起义，加入护法军。第一、二团大部官兵立即响应，少数携枪逃散，李佑文仅带十余人逃回长沙。傅良佐欲迅速扑灭湘南护法军的企图就此落空。

二、衡山、宝庆之战

（一）双方作战部署

由于湘军第一师第一旅官兵参加护法，使湘南护法军声势大振。1917年9月27日，湘军第一师师长赵恒惕从家乡赶赴衡阳，投身护法；28日，刘建藩率所部十营开抵衡阳；29日，程潜由广州抵达衡阳。10月6日，湘省护法军各路将领齐集衡阳，决定组织“湘南护法军总司令部”，公推程潜为总司令。

傅良佐之进攻湘南护法军，表明南北军队在湘决战已势不可免。桂系军阀决定组织军队援湘，以武力“驱逐傅良佐，收复湖南，以固两广门户”。9月底，桂军陆裕光师先头部队进抵衡阳。10月2日，陆荣廷在广西南宁召开军事会议，讨论援湘问题，广东督军陈炯明、海军总司令程璧光等参加了会议。会议议定了援湘军事计划：由两广出兵八十营（其中广东三十五营，广西四十五营），分编成五个军（由陆裕光、林俊廷、韦荣昌、马济、林虎分任军长），由广西督军谭浩明任两广护国联军总司令”。进军路线是：马济率粤军出韶关入湘，经攸县、醴陵取长沙。桂军分成两路：韦荣昌军由三江入湘，经新宁逼宝庆；陆裕光、林俊廷二军则出全州入湘，经永州（今零陵）、祁阳增援衡阳。两广军总的目标是会

攻长沙。

正当两广护国军准备援湘之际，傅良佐也在积极备战。9月28日，傅以第八师师长王汝贤为“湘南各军总司令”。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为副司令，负责组织指挥湘南作战；以第八师十五旅（旅长王汝勤）和第二十师三十九旅（旅长张纪）从正面进攻衡山；以湘军第二师朱泽黄旅和即将抵湘的二十师之第四十旅（旅长张建功）进驻永丰（今双峰）。10月初，北军第八师之第十五旅和第二十师之第三十九旅相继开抵长沙。嗣后到达的还有倪嗣冲之安武军二十营、晋军商震混成旅以及北洋第三师阎相文旅。

10月上旬，南北两军之间的交战，在朱亭、衡山至永丰一线全面展开。

（二）衡山战斗

湘潭是北军进攻衡山的前进基地，有三条道路可通衡山：一由湘潭经株洲，沿三门、淦田、朱亭一线；一由湘潭经茶园铺，沿熊家桥、护湘关一线，此为陆路大道；一由湘潭沿涓水至福田铺一线。为了抗击北军进犯，护法军的布防如下：第一师师长赵恒惕指挥该师之第一、二两团（欠一营），在衡山、护湘关至茶园铺沿线设防，另将一个营配置于福田铺担任翼侧警戒；刘建藩所部数营防守淦田、朱亭；林修梅率该旅之第四团驻守岳后，防敌由永丰方向窜犯。

10月6日晨，南北两军开始在湘潭县属之西倪铺接战。护法军在衡山以北只有不足两个团的兵力，却要防守从福田铺至湘江边宽约十五公里的正面，力量分散；加上装备较差（除步枪外，仅有二门炮、二挺机枪），难于阻止敌人的进攻。北军王汝勤所部由中路进攻，集中

兵力，重点突破，连占茶园铺、中路铺和白石铺等要点，逼近护湘关。护湘关位于衡山北十二公里处，两侧山势险峻，湘（潭）、衡（山）大路从山间穿过，是易守难攻之地。护法军在护湘关两侧高地构筑工事，重点设防。8日晨6时，北军分三路攻打护湘关。护法军凭险抗击，“顽强异常”，“抵死不退”。战至次日凌晨，北军从侧翼突击，仰攻肉搏，护法军力不能支，遂弃关撤退。护湘关落入敌手。

10月10日晨，北军进攻护法军在衡山北面的最后一个要点石桥铺。护法军控制附近高地，顽强抵抗。临近中午，刘建藩派数营援兵赶到战地，让正在奋战的第一师士兵撤下吃饭。但这些援兵多数是新兵，未经严格训练，缺乏作战经验，以致一有伤员，就惊慌后退。北军乘势冲击，护法军大败。

10月11日上午7时，北军向衡山外围发起攻击。王汝勤亲率该旅第二十九团及工兵营、炮队由正面实施突击，以第三十团由翼侧抄袭。护法军据守城外据点的部队经不住敌军的猛攻，纷纷逃进城内，并牵动了守城部队。护法军只得放弃衡山，分向湘江以东和衡阳退却。王汝勤旅遂轻取衡山。

北军张纪旅行动迟缓，10月11日由湘潭进抵株洲，翌日沿湘江东岸向南攻进。13日在淦田乌鸦山与刘建藩之警戒部队遭遇。双方激战两小时，刘部不支后退。张旅乘势追击，于下午7时攻占朱亭。14日，张旅向衡山靠拢，拟配合王汝勤旅向衡山以南进击。但王汝勤由于作战顺利，便不等张旅跟进，即率所部向贺家山进攻。

贺家山位于衡山与衡阳之间，左接巍巍衡山，右倚滚滚湘江，北面是宽约数里的开阔地，山势虽不高峻，

但北陡南缓，易守难攻，是防卫衡阳的天然屏障。护法军控扼贺家山，封锁山下开阔地，进行顽强阻击，遏止了王旅的推进。10月15日，北军张纪旅也投入战斗。在此前后，桂军第三军副司令贲克昭率领的先锋团和粤军第一军副司令邱渭南率领的三个营，也先后赶到贺家山一带，增援湘军。

从10月15日起，南北两军各投入兵力万余人，在贺家山一带连日激战。北军旅长王汝勤和张纪组织部队对贺家山轮番进攻，但由于不讲战术，士兵盲目射击，徒耗枪弹、炮弹，因此虽付出很大代价，但战果不佳。团长傅良藻（傅良佐之弟）战歿，部队死伤过半。加之秋雨连绵，山地泥泞，给不习惯江南气候的北军造成意外的困难。北军连日强攻，毫无进展，只好转攻为守。湘南护法军在桂、粤军支援下，经数日激战，挫败了北军的进攻，但苦于弹药不继，也未发起新的攻势。

10月21日，程潜与陆裕光、贲克昭、邱渭南等桂、粤军将领在衡阳举行会议，商定下一步作战计划。鉴于贺家山至衡山方向北军云集，护法军反击困难，而宝庆已为北军攻占，遂决定由赵恒惕指挥两团湘军并桂军贲克昭部，在原地实行坚守防御，刘建藩部出守大浦，警戒江右，而将主力向宝庆方向转移，拟出敌不意，收复宝庆，再图长沙。计划甫定，即由林修梅率所部湘军与桂军一部直趋宝庆；邱渭南之粤军三营右出攸县、新市，趋醴陵，威胁敌之后路。

（三）宝庆战斗

傅良佐派兵进攻衡山时，对宝庆方向暂取守势，仅派湘军第二师之朱泽黄旅进驻永丰，并控扼永丰与宝庆间的险要山地界岭（永丰西南三十公里），拟待援军赶到

后，再行进攻。湖南第二区守备司令周伟、第一师第三团团长宋鹤庚于10月2日在宝庆宣告自主后，为了先发制人，立即率部东进，袭占界岭（时朱旅派一营防守），前锋逼近界岭东面的青树坪，另以原永州守备司令谢国光率兵三营，经洪罗庙进逼马屋岭，袭击永丰之敌翼侧。

朱泽黄见要地界岭失守，关系重大，立即转守为攻。10月5日，朱旅倾巢出动，反攻青树坪。战至次日上午，护法军不支，退守界岭。朱旅乘胜追击，猛攻界岭。护法军立足未稳，弃守而退，界岭复陷敌手。

朱泽黄夺回界岭后，以主力驻守该地，另以参谋长周诗率兵二营迎击进逼永丰翼侧之护法军。10月10日，周诗部于马屋岭击败谢国光之护法军，进据洪罗庙。朱泽黄见翼侧威胁已经解除，遂于18日组织部队由界岭向宝庆进攻。朱将所部分为两路，以第七团团长毛树峻为左翼指挥官，第八团团长周崇岳为右翼指挥官，两路相互策应，齐头并进。19日，朱旅攻占黑田铺（宝庆东三十公里），继陷洪桥（宝庆东十八公里），直薄宝庆城下。护法军据城抵抗一夜，于20日撤离宝庆，退往杜家坪。朱泽黄进占宝庆后，接到傅良佐令其速率主力增援贺家山北军的电报，遂留两个营守宝庆，亲率四个营于10月25日出两市塘（今邵东），拟经洪罗庙趋援贺家山。

这时，贺家山战场已呈胶着状态。10月21日，桂军韦荣昌部抵达衡阳。程潜为打破战场僵局，商请韦荣昌派出所部一个团，会同湘军李仲麟、谢国光部（共六营），由衡阳左趋渣江，拟经洪罗庙攻取永丰。31日，韦、李、谢所部湘桂军于洪罗庙与朱泽黄旅相遇。双方激战竟日，朱旅不支，退守界岭，旋又退至永丰。数日后，林修梅也指挥所部湘军，在桂军陆裕光部配合下，